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研國研
究究
所所
所所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失衡的世界

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

[美] 斯蒂芬·G.布鲁克斯 威廉·C.沃尔福思 著 潘妮妮 译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斯蒂芬·G.布鲁克斯 威廉·C.沃尔福思◎著 潘妮妮◎译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
(美)斯蒂芬·G.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美)
威廉·C.沃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著;潘妮妮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ISBN 978-7-208-15537-4

I. ①失… II. ①斯… ②威… ③潘… III. ①国际关
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5013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史桢菁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

[美]斯蒂芬·G.布鲁克斯 威廉·C.沃尔福思 著 刘铁娃 译 38.00 元
潘妮妮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4
字 数 188,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37-4/D·3312
定 价 52.00 元

作者简介

斯蒂芬·G.布鲁克斯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著作有《制造安全》等。

威廉·C.沃尔福思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著作有《难以捉摸的平衡》等。

译者简介

潘妮妮

重庆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近年来主要进行日本政治和东亚区域关系研究。



更多新书信息及做书趣事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
官方微信订阅号：spph_spph 新浪官方微博：@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建中路193号 电话：021-53594508
邮箱：spph@sina.com 传真：021-63914796

责任编辑：潘丹榕 史桢菁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1870844899@qq.com)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缉思

副主编：袁明 于铁军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铁军 王正毅 王逸舟 王缉思 牛 军
归咏涛 石 斌 叶自成 关贵海 朱 锋
范蔚文 罗伯特·罗斯 罗伯特·阿特
陈 昕 查道炯 袁 明 贾庆国 唐世平
梅 然 杰克·斯奈德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前 言

献给我们的父母：

德博拉·布鲁克斯和托马斯·布鲁克斯 上一代国际关系学

M.费利西塔斯·柯蒂·沃尔福思、O.S.B.沃尔福思和蒂莫
西·A.沃尔福思

我们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方法的评价，他坚持主张，只有那些赞同他的政策方法的人才尝试美国的力量实现正而治身强善的国际约束。作者对此提出异议，尽管他并不赞同政府的对外政策过程，但自己的研究对新政策的实施能力存有怀疑。那位教授如是说：“但是，毫无疑问，本研究对布什政府支持那些政策的‘作者’不得不承认的合作者事实上是小布什政府，一位世界学者，但能够理解了对方蕴含着深刻怀疑的浅薄目光。

实际上，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在于我们至今一直认为，国际关系外政策转变，恰恰是因为这种转变表现出对那些以权力智慧的新家外部力量的外部因素的不耐烦态度，这些外部因素中有许多是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所提出的。确切地说，在着手写作这本书之前，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实主义认同的传统批判性均不再有效。而所谓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如我们在2002年发表于《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是要对抗的东欧大所带来的一场，建设带有“自利和反姿态”性质的政策。

批评者会想问“为什么”。我们的回答是，为了规范国际关系理论中非现实主义传统所主张的那些国际约束，自利和反姿态是必要的。当受到质疑时，我们必须确认这个基本假设。这个假设我们在《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有所暗示，但并没有作明确的分析和展示。为了回应批评者，我们在2003年开始写作名为《对新单边主义的近乎一致的反对》(A Nearly Consensus View against the New Unilateralism)的论文。

前 言

作者之一最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根据会上一位在国际关系领域德高望重的教授的观察，当前学者们在评论针对美国力量运用的约束时，都离不开他们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方法的评价。他坚持主张，只有那些赞同如此政策方法的人才会否认美国的力量实践正面临着显著的国际约束。作者对此提出异议，尽管他并不赞同政府的对外政策过程，但自己的研究对约束的实际效力存有怀疑。那位教授回道：“但是，毫无疑问，你研究的合作者是支持那些政策的。”作者不得不声明他的合作者事实上是小布什政策的坚定批评者，但这却招致了对方蕴含着深刻怀疑的戏谑目光。

实际上，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在于我们坚信小布什推动了错误的对外政策转变，恰恰是因为这种转变表现出对那些被视为能够约束美国力量的外部因素的不耐烦态度，这些外部因素中有许多是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得出的。确切地说，在着手写作这本书之前，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实主义认同的传统制衡性约束已不再有效。而所谓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如我们在2002年发表于《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是要对抗约束消失所带来的诱惑，遵循带有“自制和高姿态”属性的政策。

批评者会想要问“为什么”。我们的答案是，为了规避国际关系理论中非现实主义流派所主张的那些国际约束，自制和高姿态是必要的。当受到质疑时，我们必须确认这个基本假设。这个假设我们在《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有所隐涉，但并没有作明确的分析和展示。为了回应批评者，我们在2003年开始写作名为《对新单边主义的近乎一致的裁决》(A Nearly Unanimous Verdict against the New Unilateralism)的论文。

我们期望展示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辨认有效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外部因素的经纬，从而解释学术界针对小布什政府的傲慢风格和单边行动倾向的近乎一致的不满。而我们论述的点睛之笔是，尽管现实主义有着关于两极和多极体系下的约束因素的最完美理论，但这却无法适用于单极体系。这一最强调实力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最无法解释要如何约束一个异常强大的国家。

那篇论文并没有完成。我们展示各理论流派是如何产生关于美国力量的强力外部约束的观点的，这种努力一直在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这些理论或者完全不能体现因果联系，或者即使体现了，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它们对今天的美国有突出意义。要确证这一发现，要对它进行经验性的证明，并且尤为重要，要对它作出解释，我们所需要的工作远超过一篇论文。这就是我们写作这本书的由来。

致 谢

由于我们幸运地置身于一所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这本书才得以完成。我们受惠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约翰·斯隆·迪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John Sloan Dicke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中心不但给我们提供经济资助，还为这本书的初稿主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分析研讨会。查理·格拉泽(Charlie Glaser)和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来到汉诺威，在研讨会上提供了批判性的思想指导。在这次研讨会上，还有我们写作这本书的数年间，我们在达特茅斯的同事康灿雄(Dave Kang)、内德·勒博(Ned Lebow)、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迈克·马斯坦杜诺(Mike Mastanduno)、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阿尔·斯塔姆(Al Stam)、本·瓦伦蒂诺(Ben Valentino)、克里斯·沃尔福斯(Chris Wohlforth)和肯·亚洛维茨(Ken Yalowitz)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和智识上的支持，其中不乏鞭辟入里的批评。来自达特茅斯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暑期资助，以及——最为重要的——学院的教员研究资助，为我们完成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时间保障。我们还要感谢以下达特茅斯本科学生的帮助：马特·艾利(Matt Ailey)、普尼特·康特(Pooneet Kant)、乔希·克尔诺夫(Josh Kernoff)、卡梅伦·基斯特勒(Cameron Kistler)、丹·马奥尼(Dan Mahoney)、伊斯雷尔·马克斯(Israel Marques)、布赖恩·史密斯(Brian Smith)和戴维·沃尔夫(David Wolff)。达特茅斯的研究数字化团队的里克·巴顿(Rick Barton)为书中的一些表格和图示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同时，我们也极大地受益于在达特茅斯学院之外的机构中获得的大量机会，使我们得以审查自己的研究。我们感谢迈克·德施(Mike

Desch)和尤金·霍尔茨(Eugene Gholz)把我们的书选作首届孤星国家安全论坛(Lone Star National Security Forum)第一次会议的讨论文本,这是由得州农工大学布什学院(Bush School at Texas A&M University)和得克萨斯大学约翰逊学院(LBJ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at Texas)共同主办的年会。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好意地在外交关系协会为本书安排了一次研讨会。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邀请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他的系列研讨会上发表书中的几个章节。此外,我们还以个人或共同的形式先后在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挪威国际关系研究所*、俄亥俄州立大学、威尔士大学阿伯瑞特威斯分校、诺丁汉大学、南加州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哈佛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发表过本书的部分内容。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太多学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评论就没有现在的成果。最后,我们还受益于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他耶鲁大学研究生研讨班的学生在阅读初稿后的反馈。

我们还要特别提到以下各位,他们回应了我们的请求,仁慈地分享了他们在特定章节问题上的专业意见。查理·格拉泽提供了一系列的长篇评论,使得第二章可以数易其稿。来自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ve Van Evera)的反馈对于改进第三章的论点十分有帮助。尤金·霍尔茨、道格·欧文(Doug Irwin)、尼娜·帕夫尼克(Nina Pavcnik)和杰伊·香博(Jay Shambaugh)为修订第四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第五章则大大地受益于邓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和埃里克·富腾(Erik Voeten)的洞见。伊恩·赫德(Ian Hurd)、杰夫·勒格罗(Jeff Legro)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就第六章反馈了宝贵的批评。

我们感谢文中引用和参考的所有文献的作者。当然,书中所有论点和分析所带来的责任,都由我们自己承担。

* 原文为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疑为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之误。——译者注

第一章 导论

目 录

1 丛书总序

1 前言

1 致谢

1 第一章 导论

23 第二章 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和制衡性约束

61 第三章 现实主义、威胁均衡论和“软平衡”约束

98 第四章 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源自经济相互依赖的约束

147 第五章 制度主义与声望的约束

169 第六章 建构主义与合法性的约束

204 第七章 新议程

第一章 导 论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国在世界强国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从来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体系曾含有一个具备如此压倒性实力的国家。¹随着 2001 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世界舞台上的太多地方都覆盖着美国权力的影子,以致很多学者认为它算得上是一个“帝国”了。²但是,伴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席卷伊拉克的混乱让美国付出了高昂代价,这类观点随之归于沉寂,关于美国权力边界的讨论则成为压倒性的主流。许多分析人士开始比较美国和 20 世纪初的英国,后者是一个过度扩张的、衰落的、“在过于巨大的命运之球的重压下蹒跚行进”的“疲惫的巨人”³。

是什么导致了对美国实力评估的突然转向?大多数观察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就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提及的:“不管用我们能够设想到的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在世界能力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都要大于历史上的任何国家。”⁴他的这个陈述放在 1991 年到 2006 年间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准确的,他所描述的美国的首要地位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哪怕那些关于美国经济、军事和技术竞争力的最悲观的预言都能实现。对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在 2003 年之后实质改变的是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政治功效的评估。突然之间,学者们都深刻地感受到物质上的优势并不总是会转化为需要的结果。对许多学者而言,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遭遇的挫折,证明了美国力量受到的约束,这个判断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

在过往超过三十年的时间内,大量国际关系的理论知识都被用于说明国际环境是如何塑造国家行为的。⁵当下,学者们应用每一个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来

识别那些损害美国首要地位的价值的价值的外部(或者说,体系)约束,这就大大限制了美国可以追求的安全政策的范围。学者们强调国际关系体系中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各种要素:国际制度、动态平衡、全球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合法性。他们的简单结论预测了未来数十年国际政治的轮廓:美国力量首要地位的政治功效会被削弱乃至否定,这是由国际体系长久以来的属性决定的。

这本书的目的是对学者们所强调的外部约束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价,从而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全球角色。这就需要回答四个问题:美国是否面临着自身力量被其他大国的制衡联盟所抵制的紧迫局面?既然美国受到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它的安全政策是否更容易受到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在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中,美国是否牢牢地受制于维持良好的整体声誉的需要?美国是否需要通过坚守现有的规则来保持其合法性,从而维护当今的国际制度秩序?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一发现颠覆了解释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有力要素的传统知识。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美国前所未有的力量集中总体上导致长期处于国际关系研究核心位置的“体系属性”失去了约束效力。

鉴于美国的首要地位可能长期存在,这一总体结论对思考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本书的终章,我们勾勒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用于处理美国首要地位对国际关系分析所形成的挑战,并明确一个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性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的替代性的大战略选择。

论 点

本书涉及的理论流派都论述过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我们的目的是分析它们的命题。我们承袭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安全政策不只包括单纯的武力威胁,也包括利用非军事工具来推进安全利益。关于体系约束(systematic constraints),我们是指来自美国外部的约束,它们总体上基于国际体系运作,而非源自某组特定行为体针对某次

特殊事件的回应。更具体地说,体系约束就是国际体系属性本身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通过禁止特定行为或提高行为成本,或者强迫实行其他特定行为来实现。

学者们强调,国际体系从冷战时期两极到目前单极的转变对美国并非完全有利,因为这会带来制衡的前景、日益提升的国际经济依赖、在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中更强烈的维持良好声誉的需要,以及更大的对美国行为合法性的挑战。传统的认识是,这些体系约束阻碍了美国力量对其安全的实际投射效果,使美国物质实力的优势远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更普遍性的说法是,现有的理论观点汇集成一个看法,即当一个国家站在或者接近权势顶峰时,它就受到更多的、程度更强的国际体系属性的影响,这些属性大大削弱了该国拥有的用于追求安全目标的附加能力的边际效用。⁶

这种看法的有效性取决于体系约束在单极体系下是否能发挥和在两极/多极体系下同样的功用,后者是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然而,现有的研究都没有明确地致力于回答这一关键问题。其结果是,基于现有学术常规的研究都存在以下一个或多个缺陷:不加批判地应用那些解释过去国际体系的理论;论点未接受系统性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检验;理论角度单一;并非专注于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为了考察这些常规性知识,我们有必要检验关键的体系约束要素,以确定它们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移植到单极体系下运转。我们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开了先例,它检验了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过的所有体系约束。

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知识。我们考察的结果是:当一个国家力量集中的增长程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对其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会在总体上失效。学者们坚持认为体系约束具有潜在的重要性,这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假定那些用于解释过去的国际体系的理论可以直接适用于单极体系。

在学术常规的背后

学术文献中所讨论的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通常有两类:体系约